

中国现代三大伟人

施友松 著

——个性与时代转换



中国现代三大伟人

——个性与时代转换

施友松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冈 宁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三大伟人:个性与时代转换/施友松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5

ISBN 7-5006-2141-8

I. 中… II. 施… III. 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研究—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069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东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9.2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1.00 元

序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必然性体现于偶然性之中，“发展的加速与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对于时代的每一次重大转换，伟人的性格力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的人格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如何交汇和冲撞？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开辟的研究领域。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讲过一句名言，历史伟人可以“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影响到社会的命运。”性格是一种力量，一种驱动力。在时代转换的历史关头，伟人的政治品格，是推动社会转变的潜能，是唤起人们都围绕他燃烧的“星星之火”。而历史研究，包括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非常需要我们揭示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巨人之性格的历史底蕴。这本《中国现代三大伟人——个性与时代转换》，正是这样一本实践之作。

施友松是中央党校理论部 1986 级研究生。近几年来，他专注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这些伟人品格的研究。1991 年，在我主编的《1956—1976 年毛泽东的思

想与理论》一书中，他写过“晚年毛泽东的个性与毛泽东晚期思想”、“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个专题。这可以说是他为写作《中国现代三大伟人》一书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和研究准备；后来，我还看到过他参加写作的《一代巨人毛泽东》一书。从这些研究中，看得出他的科研潜力功底厚实，研究方法已经深入到政治心理学、社会文化学和历史哲学的层次。现在这本书，无论从逻辑结构上，还是从理论分析上，都可以显示出作者善于从平凡朴实中发现独特，从历史比较中挖掘异同，尤其是第一、二、三、七等章，透凝着他的深刻思考与写作风格。作者写作此书，前后花了近4年的时间，可谓尽心尽力。至于对此书理论成果的评价，还有待读者的公论。

我愿此书成为促成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史上政治伟人的一个触媒。

周 承 恩

1994年11月于中央党史研究室

目 录

绪 论：时代转换与伟人性格魅力	[1]
——历史唯物主义与伟人性格	[1]
——近代中国对历史伟人的企盼	[2]
——三个时代的伟大开拓者	[4]
第一章：文化培育与实践锻造	[6]
A：文化环境与性格培育	[7]
A-1 孙中山：第一次踏出国门影响了他的一生；反抗与忍让并存	[7]
A-2 毛泽东：农家本色与 6 年私塾；实现自我与“个人精神主义”；运动与斗争是人生最大快乐	[12]
A-3 邓小平：从小胆识过人；不信邪；倔强、自信；讲究科学	[18]
B：革命实践与性格锻造	[21]
B-1 实践领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	[22]

B-3 “改革大师”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超越—— 时代转换的恢宏情怀与突破胆识；改革—— 现代中国发展的大思路；开放——巨人视 野与使中国回到世界怀抱	[80]
第三章：权威类型与转换张力	[95]
A：权威三类型	[96]
A-1 游离不定的权威：孙中山的影响力	[97]
A-2 超凡魅力型权威：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101]
A-3 法理性权威：邓小平对历史转折的巨大 政治贡献	[105]
B：转换张力	[112]
B-1 权威分散	[112]
B-2 毛泽东的权威：中国革命时代转换的加 速器	[116]
B-3 邓小平：树立“两个权威”	[122]
C：时代转换中的权威确立	[132]
第四章：知行方式与转换波幅	[134]
A：再现性思维与欧美模式	[135]
B：创造性与浪漫主义的彼此呼应	[139]
B-1 创造：毛泽东的独特人格	[139]
B-2 浪漫情怀与灵感思维	[142]
C：创造性、现实性和开放性的和弦	[145]

C-1 一切从实行出发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	[146]
C-2 走自己的路, 创新求异	[148]
C-3 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思维 结构	[149]
C-4 “三个面向”的开放性思维	[151]
第五章: 政治品格与改革构建	[155]
A: 中国国情与实事求是	[155]
A-1 孙中山晚年领悟的真谛: 西学东渐必须 “合乎中国国情”	[155]
A-2 毛泽东: 从“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 话”到“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	[157]
A-3 邓小平: 现实主义改革政治家	[162]
B: 唤起民众与群众路线	[173]
B-1 第一“上帝”与群众路线	[173]
B-2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182]
C: 人格独立与独立自主	[199]
C-1 西化悲剧	[200]
C-2 教条主义悲剧	[201]
C-3 毛泽东与独立自主	[202]
C-4 邓小平不打“苏美牌”	[204]
第六章: 情感倾向与文化构建	[207]
A: 文化构建的不同方程式	[207]

A-1 孙中山：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 文化观	[207]
A-2 毛泽东：新文化的三维特性与文化转型	[211]
A-3 邓小平：文化观念变革与文化发展战略	[219]
B: 情感倾向与文化发展	[227]
B-1 专注于大众文化	[227]
B-2 “两个尊重”、“三个面向”和与世界文 明接轨	[233]
第七章：个性特征与社会外观.....	[242]
A: 坚韧、自信与理想社会构建	[242]
B: 求是、求实与两次历史性飞跃	[256]
C: 求变、求异与社会变革	[261]
D: 果断、果敢与重大历史转折	[269]
结束语：时代转换与伟人性格塑造.....	[275]
后 记.....	[278]
参考书目.....	[279]

绪 论

时代转换与伟人性格魅力

——历史唯物主义与伟人性格

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其超常的重要作用而见诸经史之传，屹立于伟岸之林，除了取决于他所代表的阶级、时代、政治集团等基本要素之外，还由于他独特的性格魅力。马克思说：历史的必然性体现于偶然性之中，“发展的加速与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历史唯物主义巨匠普列汉诺夫指出：“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性及其范围，却要由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当时的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个人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其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著作选读》第2卷，第359页）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肯定伟人性格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社会命运”的

作用的。但问题的更深层次是，伟人性格的充分展现及其对社会作用的方式、力度，只能在某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下，才更显出其威力。戴维·巴伯在他的《总统的性格》一书中写道：性格是一种力量，一种原动力，围绕着它人们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他的工作作风也从性格中汲取动力。他说，假如一位美国总统，“他是幸运的和强有力的，他就能够从这种环境中唤起一种新的能量、新的视觉和新的工作方式来适应不断更替着的时代。否则，他将会引导我们渐渐走向死气沉沉，最终酿成悲剧。”（《总统的性格》，四川人民出版社，第754页）

——近代中国对历史伟人的企盼

伟人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使伟人得以产生和锻造；时代对伟人的企盼，同时也就是对伟人的塑造。伟人格与时代转换的要求相吻合，伟人的创造力便得以充分作用于社会，推动时代的发展。社会，在某个阶段内，正是在这种伟人性格、领袖集团性格与社会性格的和谐、冲突、协调、撞击中，产生力的“四边形”，潜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转换中，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伟人的个性品质尤其是性格特点，有着其特殊的企盼。她特别需要创造性。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常常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侵略”打断按部就班的步伐，西方的“老师”总是不让东方的

“学生”按照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去谋求现代化，因此，东方的“学生”，必须创造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环境。任何“邯郸学步”式的模仿，都无益于自身的进化，反而越来越陷于民族的灾难。她特别需要自主性。从早期民主主义者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康梁变法中的“百日维新”；从孙中山创立英法式的民国，到早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梦想的实现与未来的梦想，都证明了靠“引进”和“输入”模式的破灭，独立自主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民族的独立，革命方式的自主，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生存条件。她特别需要坚韧性和灵活性。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路漫漫其悠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各种恶势力的“角斗”，没有英勇、坚定的角斗士精神，无异于自我灭亡；而力量的多边形与险象丛生的斗争环境，对于一个“有勇无谋”的政治领袖来说，无异于轻量级拳手对重量级拳王。正如有人说：政治家的悲剧，有时也在于他有很高的理想，而缺乏灵活性；他的奋斗往往毁于自身的固执和顽强。她特别需要民众性。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政治舞台，最基本的不在于上层，不在于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与“政变”，而在于广大劳苦大众所能给予伟大人物提供的信任程度、政策响应和运动跟进。离开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占85%的农民群众，再伟大的人物，在中国都难以成功。

——三个时代的伟大开拓者

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历史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其中开辟大时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三位伟人：第一是孙中山，第二是毛泽东，第三是邓小平。他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的三个典型的时代转换。孙中山的首要功绩是推翻了封建帝制，他提出的建立民国和工业化的“建国方略”，其基本纲领和设计蓝图，是模仿 19 世纪早期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孙中山是现代中国的“仿效时代”的集大成者，他代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特别是仿效西方政治体制的伟大追求和取得的成效。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把“仿效时代”推向顶峰，但同时也宣告了“仿效模式”的最后破产。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性格，也与仿效模式的要求基本吻合：模仿多于创造，依赖多于自主，利益群体与民众脱节。这三个致命的性格弱点，在先行者孙中山的身上表现得有多么明显，人们是不难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创造时代”，而毛泽东性格中的创造型、独立自主以及天然的民众情绪，都给中国革命史以极其鲜明的印记。因此，“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是时代与伟人性格的真切呼应。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从微观个性的本质上说，是毛泽东性格的民族形式的外化，因此，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邓小平，这位具有

非凡政治意志力，一生饱受波折、刚毅过人而又善于以柔御刚的改革政治家，受任于“败年之际，危难之中”，他巧妙治国，以其“唯重实效”的治国之术与宽大简易、不拘一格的作风，游刃于现代化进程。这位全国人民及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疑代表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从开拓、成型及至发展，主要模块和基本构建，都展示了他这位“总设计师”的个性特征。可以说，当代体制改革的力度，社会发展的深广，建设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定形，都无不浸透着邓小平的性格内核。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仍将是当代联系最密切的旋律。

第一章：文化培育与实践锻造

20 世纪的三位改变时代的伟人，他们的出身和个性各异，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选择终生信仰的过程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 20 世纪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时代开拓者，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当历史将这三位巨人并肩摄入镜头时，中华民族的桥梁在他们宽阔的肩膀上构建而成，时代的转换也把他们历史伟人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从摇篮中看出来。民族和国家的成长也有着类似的一面；他们必须继承其祖先的特性。”美国学者德托克维尔说。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性格，其稳定性将作用于他的一生。

A：文化环境与性格培育

A-1 孙中山：第一次踏出国门影响了他的一生； 反抗与忍让并存

12岁以前的少年孙中山，是在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翠亨村度过的。在这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的4个子女中，孙中山属老三。父亲孙达成先后租种了6亩半地，靠耕种水稻、杂粮和养些家畜为生。尽管他缠足的母亲杨氏和年幼的哥哥孙眉帮着下地干活，也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当父亲的只得兼当村中的更夫，一年可得12石谷以济补不足。孙中山3岁时，15岁的哥哥不得不到地主家当长工，两年后又远涉重洋到檀香山的农牧场当雇工。6岁的孙中山，迫于生计已经开始上山割草、拾柴和捞猪料，出海取蛭。到了7岁，已是上学的年龄，但因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不能入学读书。直到10岁，才入了本村冯式宗祠内的私塾读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下地插秧、锄草和放牛。那时的孙中山，常常是光着脚穿条破裤子，跟父亲一起在田间劳动。“到15岁才有鞋子穿”的孙中山曾说过，自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直到13岁以后，其兄孙眉在海外逐渐发迹，才使他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变化，由贫农户向华侨资本家转化。